

金代后期政治生态与文学风格的演变

沈松勤 龙小松

(浙江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金代南渡之后,文学风格大变,由明昌、承安时期的浮艳嬗变为贞祐之后的奇古、风雅。这与金代后期士人对章宗后期政治的反思以及蒙古入侵、金国衰落、权臣干政和宣宗、哀宗两朝渴望中兴等金代后期政治生态有关。由于学养和人生际遇的不同,文学革新的阵营分离出重学养、主师古、倡导中之美与重天赋、主师心、追求奇古险怪风格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学群体。

[关键词] 政治生态; 浮艳; 风雅; 文学主张; 审美取向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Ecology and Literary Style in the Late Chin Dynasty

Shen Songqin Long Xiaos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 Chin Dynasty, the literary style changed largely: the flowery in the Ming-ch'ang and Ch'eng-an periods evolved to be the archaic, elegant in the Chen-You period. This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political ecology then, which involved the intellectuals' reflection on the politics of the late period of Emperor Chang-tsung, the Mongolia's invasion, the decline of Chin Dynasty, the interference of the powerful ministers in the state affairs, the yearning of Emperor Hsuan-tsung and Emperor Ai-tsung for resurgence and so on.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in their scholarship and self-cultivation as well as life experiences, the literati who tried to promote literary innovation were divided into two entirely different groups. One that stressed self-cultivation, and advocated learning from the ancients and initiating neutral beauty; the other that believed in natural gift and advocated expressing one's inner being and pursuing eccentric and archaic style.

Key words: political ecology; flowery; elegant; literary view; aesthetic orientation

金代明昌、承安年间盛行尖新、浮艳的文风,贞祐南渡后,在赵秉文、李纯甫等人的革新下,“文多学奇古,诗多学风雅”,且由宗宋转变为师唐:“屏山幼无师传,为文下笔便喜左氏庄周,故能一扫辽宋余习。而雷希颜、宋飞卿诸人,皆作古文,故复往往相法效,不作浅弱语。赵闲闲晚年,诗多法

[收稿日期] 2008-07-08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作者简介] 1. 沈松勤,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宋代文学研究; 2. 龙小松,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宋金文学研究。

唐人李、杜诸公，然未尝语于人。已而，麻知幾、李长源、元裕之辈鼎出，故后进作诗者争以唐人为法也。”^{[1]85} 所谓“风雅”，《毛诗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2]269} 又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2]271} “雅者，正也，言王教之所由废兴也。”^{[2]272} 也就是说，诗歌的内容或主题要以反映现实生活、关注民生疾苦为主，要突出诗歌的儒学教化功能，以达到干预政治目的。南渡以后诗学“以唐人为指归”，刘祁《归潜志》中记载了当时文坛风行师法唐人的情形，如“(完颜璡)甚有唐人风致”；“(辛愿)喜作诗，五言尤工，人以为得少陵句法”；“(麻知幾)为文精密巧健，诗尤奇峭，妙处似唐人”；“(王郁)为文宏肆奇古，动辄数千百言，法柳柳州。歌诗飘逸，有太白气象”；“(术虎邃)甚有唐人风致”；“(乌林答爽)其才清丽峻拔似李贺”。南渡之后，文学风格为什么发生了转变？诗学风雅与“以唐人为指归”之间又有何关系？为什么在倡导诗风革新的阵营中，又分离出两个追求不同风格的文学群体？这些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学界目前关注的却很不够。笔者认为上述问题与当时的政治生态有密切联系。

—

金代女真在建国之前文化相对落后，当时只有叙事形式的简单口头文学，流传至今者极少。女真人中会汉语者寥寥无几，汉语言文学无从谈起。金代前期的文学创作主体主要是由辽、宋入金的汉族士人。《中州集》卷一“蔡太常珪”小传云：“国初文士如宇文大学、蔡丞相、吴深州之等，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3]33} 这些由宋入金的士人文学创作自然带有强烈的宋代文学“母体”的特色，并以追慕、仿效苏、黄为主。他们的创作取向奠定了金朝文学“宗宋”的大势。元好问在《赵闲闲书拟和韦苏州诗跋》中慨叹道：“百年以来，诗人多学坡谷。”^{[4] 卷四〇,844} 翁方纲在《石洲诗话》卷五中亦多次提出“苏学盛于北”的观点。可是为什么南渡以后转变为崇尚唐诗呢？

赵秉文《中说类解引》曰：“大抵唐贤虽见道未至，而有忠厚之气。至于宋儒，多出新意，务诋斥，忠厚之气衰焉。学圣人之门，岂以胜劣为心哉？”^{[5]卷一五,208} 赵氏又在《竹溪先生文集引》中云：“文以意为主，辞以达意而已。古之为文不尚虚饰，因事遣辞，形吾心之所欲言者。间有心之所不能言者，而能形之于文，斯亦文之至乎？”^{[5]卷一五,205} 在他看来，文学不过是表达心声而已，唐人比宋人更具有忠厚之气，因此，他们的文学更具风雅之质。元好问曾就“风雅”与“唐诗”之间的关系作了一番明确的解释，其《杨叔能小亨集引》云：

贞祐南渡后，诗学大行。初亦未知适从。溪南辛敬之、淄川杨叔能以唐人为指归……诗与文，特言语之别称耳。有所记述之谓文，吟咏情性之谓诗，其为言语则一也。唐诗所以绝出于《三百篇》之后者，知本焉尔矣！何谓本？诚是也。古圣贤道德言语，布在方册者多矣，且以“弗虑胡获？弗为胡成？”“无有作好、无有作恶”“朴虽小，天下莫敢臣”较之，与“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敬共明神，宜无悔怒”何异？但篇题句读不同而已。故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也，三者相为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发乎迩而见乎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小夫贱妇、孤臣孽子之感讽，皆可以厚人伦、美教化，无它道也。故曰不诚无物。夫惟不诚，故言无所主，心口别为二物，物我邈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来，人之听之，若春风之过耳。其欲动天地、感神鬼，难矣！其是之谓本。唐人之诗，其知本乎？何温柔敦厚、蔼然仁义之言之多也！幽忧憔悴，寒饥困惫，一寓于诗，而其厄穷而不悯、遗佚而不怨者，故在也。至于伤谗疾恶，不平之气不能自掩，责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辞愈缓。优柔屡倾，使人涵泳于先王之泽，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幸矣！学者之得唐人为指归也。^{[4]卷三六,762-763}

从上可知，在金代后期那些一流文学家眼里，唐诗比宋诗更符合温柔敦厚的标准，更具备厚人伦、美教化的功能。这是金代后期诗坛崇尚唐诗的根本原因。

二

南渡以后,李、赵等人为什么要反对章宗朝盛行的浮艳文风?金代后期文学由主浮艳转为尚风雅,不仅是文学现象,也是政治现象;它不单单是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更在于当时政治生态的影响。刘祁《辨亡》为我们提供了些许信息:

章宗聪慧,有父风,属文为学,崇尚儒雅,故一时名士辈出。大臣执政,多有文采学问可取,能吏直臣皆得显用,政令修举,文治烂然,金朝之盛极矣。然文学止于词章,不知讲明经术为保国保民之道,以图基祚久长。又颇好浮侈,崇建宫阙,外戚小人多预政,且无志圣贤高躅,阴尚夷风;大臣惟知奉承,不敢逆其所好,故上下皆无维持长世之策,安乐一时,此所以启大安、贞祐之弱也。^{[1]136}

章宗在“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6]卷一二,285}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和完善世宗未竟的事业,使得金朝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达到了极盛时期^{[7]147}。国家的繁荣昌盛,让章宗等统治者滋生了意满自得的情绪,他把精力主要用在如何文饰其武功上面,朝廷上下也渐渐追逐奢靡浮华。杨奂《跋赵太常拟试赋稿后》:“明昌以后,朝野无事,侈靡成风,喜歌诗。故士大夫之学,多华而少实。”^{[8]2785}

由于章宗等统治阶层放松了对励精图治的追求和封建制度自身的局限性等原因,金朝在章宗朝后期开始由盛转衰。此外,章宗私心作祟,选择“柔弱鲜智能”^{[6]卷一三,290}的卫绍王永济作接班人,进一步加剧了金朝后期积弱的局面。与此相反,北方的蒙古却日益强大。卫绍王时,“政乱于内,兵败于外,其灭亡已有徵矣”^{[6]卷一三,298}。宣宗在逆臣胡沙虎的扶植下登上皇位,此时女真猛安谋克已经堕落,加上朝政紊乱,至贞祐二年时,山东、河北诸郡除真定、清、沃等数城外,其他均已失守,河东州县亦多残毁。于是宣宗决意南迁。

金朝由“致治极盛”很快衰落而处处挨打、退守汴京,让士人们难以接受。痛定思痛,究其根源,如前揭刘祁、杨奂所言,他们认为章宗朝就埋下了积弱的祸根。“侈靡成风”的腐朽生活成为浮艳文风的沃土,浮艳文风又成为金朝衰落的“催化剂”。因此,那些有志于拯救金朝的士人力图革除浮艳软媚的文风,而倡导风雅尚古之风,祈望有助于金朝的复兴。

南渡之后新文风的倡导除了与上述历史背景紧密相关外,还与金宣宗、哀宗救亡图治的抱负有关。宣宗即位之后,欲以金朝最贤明的君主——世宗为榜样,谕尚书省“事有规画者即规画,悉依世宗所行行之”。紧接着又对宰臣说:“朕即大位,群臣有所见,各直言勿隐。”事隔数日,又诏谕六品以下官,“事有可言者言之无隐”,并于贞祐元年冬十月置招贤所。此外,宣宗执政之初还实施了一些新政,如在官吏升迁赏罚方面,要求诸色人与本朝人一体,不得妄生分别,违反者以违制论处^①。在赵秉文看来,“今圣人(宣宗)明发不寐,轻念元元,屈己下贤,尊师重道”,且“多难之际,社稷倾危不顾,苍生倒悬而不解,其自为谋则善矣,仁人之心固如是乎”^{[5]卷一九,229}。宣宗实施新政以图中兴,让赵秉文等人看到了希望;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淑世精神,让他们时刻关注民生。这两方面的因素促使他们秉承前贤以文载道、以文明道的优良传统,而倡导雅正的诗风。

宣宗卒无成功,继承者哀宗即位。哀宗也是一位有志于政治的帝王,欲挽狂澜于既倒。《归潜志》卷七载:“正大初,末帝锐于政,朝议置益政院官,院居宫中,选一时宿望有学者,如杨学士云翼、史修撰公燮、吕待制造数人兼之,轮直。每日朝罢,侍上讲《尚书》、《贞观政要》数篇,间亦及民间事,颇有补益。”当时,赵秉文等上《君臣政要》,傅慎微作《兴亡金镜录》百卷,史奕进《大定遗训》,吕造著《尚书要录》,王鹗著《论语集义》、《应物集》、《汝南遗事》,桂瑛著《语孟旁通》^{[9]卷四六,766},杨奂作万言

^① 宣宗执政之初的新政举措,见《金史》卷一四《宣宗纪上》。

策指陈时弊^{[4]卷二三,510}。

赵秉文等人上《君臣政要》等书的目的，赵氏《贞观政要申鉴引》略有所云，兹摘录如下，可见一斑：“钦惟圣上聪明仁孝，超皇轶帝，而犹孜孜治道，俯稽前训。然一日万几，岂能遍览，谨撮其枢要，附以愚见，目之曰《贞观政要申鉴》。文理鄙拙，无所发明，特于鉴戒申重而已。昔张九龄因明皇千秋节，进《金镜录》以伸讽谕。臣窃慕之，谨以圣寿万年节，缮写献上。”^{[5]卷一五,209}由此可见，哀宗图治引发了士大夫们劝谏讽谕的热情。

哀宗“尊师重道，经筵有官，劝农薄赋，黜陟有条。寸兵尺铁，不挑衅四方；固陋就简，不增广于宫阙”^{[10]371}。这无疑给末世中的士人打了一剂“强心针”，尽管这只是风雨中摇曳的残烛，却刺激了士人们文学创作主风雅的激情。

针对明昌浮艳尖新诗风中艳靡和拘律的弊病，赵、李等人提出诗文主意的理论主张。赵秉文主张“文以意为主，辞达意而已”。李纯甫《西岩集序》认为：“人心不同如面，其心之声发而为言，言中理而谓之文，文而有节为之诗，然则为诗者，文之变也，岂有定体哉？”^{[8]2626-2627}王若虚赞同其舅父周昂的诗论：“文章以意为之主，字语为之役。”“雕琢太甚，则伤其全；经营过甚，则失其本。”^{[11]52}刘祁云：“夫诗者，本发其喜怒哀乐之情，如使人读之无所感动，非诗也。予观后世诗人之诗皆穷极辞藻，牵引学问，诚美矣，然读之不能动人，则亦何贵哉？……今人之诗，惟泥题目、事实、句法，将以新巧取声名，虽得人口称，而动人心者绝少，不若俗谣俚曲之见其真情而反能荡人血气也。”^{[1]卷一三,145-146}他们一致提出了诗文应以意为主的观点，反对过分经营和华丽辞藻。这有利于克服明昌、承安期间以宫廷生活为主的咏物唱和之作内容单调、注重雕琢的弊病。

三

不过，在主张诗文革新的阵营中，分离出了以赵秉文为代表和以李纯甫为代表的两个文学群体。由于他们的学养、人生际遇不同，各自的审美取向和对革除旧弊途径的看法分歧也就比较大。赵秉文、王飞伯、王若虚等人重学养，主张转益多师、博采众长、自成一家，提倡类似《诗经》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元好问是这一理论的集大成者。而李纯甫、雷渊、李天英等人重天赋，主师心，走上了偏重奇崛险怪的诗学之路。

复古为了革新，革新又需借助于复古。如何对待和学习古人，是金代后期文人们诗文革新必须面对的。赵秉文在《答李天英书》中明确提出必须转益多师，并以自身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六经吾师也，可以一艺名之哉？……太白、杜陵、东坡，词人之文也，吾师其词不师其意；渊明、乐天，高士之诗也，吾师其意不师其词。”^{[5]卷一九,231}至于文学的功能，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诗文之意，当以明王道、辅教化为主。”^{[5]卷一九,231}《归潜志》卷八亦载赵秉文认为“小诗贵风骚”。

在主张诗文师古、“贵风骚”的同时，赵秉文又倡导“中和”之美。其《性道教说》中云，“中者天下之大本也”^{[5]卷一,2}；论中和时称：“不偏谓中，不倚之谓中，中者天下之正理……然则中者和之未发，和者中之已发；中者和之体，和者中之用。非有二物也，纯是天理而已。”^{[5]卷一,4}学术上主张中和之道，体现在文学上也是如此。如他于北宋百年间最称道欧阳修之文，因为欧公之文“不为尖新艰险之语，而有从容闲雅之态”^{[5]卷一五,205}，合乎“中和”之美的准则。王飞伯主张为文“取韩、柳之辞，程、张之理，和而为一，方尽天下之妙”；“学诗当自三百篇始，其次《离骚》、汉魏六朝、唐人，近皆置之不论，盖以尖慢浮杂，无复古体”^{[1]卷三,24}。元好问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金代后期诗坛“风雅”理论。元氏自幼受到其父元德明的诗学熏陶，元德明作诗“不喜雕饰，清美圆熟，无山林枯槁之气”^{[3]卷一〇,526}。元氏十四岁时，受业于郝天挺。郝氏要求生徒勿求速售，重慈、孝、义^{[4]卷二三,517-518}。后来激励元好问标举“风雅”的是赵秉文。金宣宗兴定元年，元好问以《箕山》等诗文干谒当时文坛盟主赵秉文，赵氏

见后大为激赏，“以为少陵以来无此作也，以书招之，于是名震京师，目为元才子”^{[12]394}。此后，元好问以揭举风雅为己任，“风雅久不作，日觉元气损”（《别李国卿三首》之二）；“风雅三百正而葩，何以蔽之思无邪”（《太中大夫刘公墓碑》）。

元好问开始标举风雅理论是在早期所作的《论诗三十首》中。元氏开宗明义地提出，诗文正体是以《诗经》为圭臬、汉谣魏什为流的风雅之作。其中元氏对建安风骨、陶渊明、陈子昂、杜甫等极其推崇，而鄙视齐梁艳声，并尖锐地批判了卢仝、李贺之类的险怪诗风。郭绍虞先生曾极为精辟地指出，“元氏论诗宗旨，重在诚与雅二字”；“以诚为诗之本，以雅为诗之品”^{[13]62}。最能表现元氏倡导温柔敦厚的风雅之说的，是前面引及的其六十岁时所作的《杨叔能小享集引》。

金代后期诗歌复古师唐、“以唐人为指归”的转变，“由赵秉文首发其端，实际上却是由元好问等人通过南渡以后的创作实践全面完成的”^{[14]134}。辛愿和杨宏道等人的诗歌以唐诗为指归，主要反映民生疾苦和抒发自我情怀。如辛愿的《乱后》：“兵去人归日，花开雪霁天。川原荒宿草，墟落动新烟。困鼠鸣虚壁，饥鸟啄废田。似闻人语乱，县吏已催钱。”^{[15]2137}全诗以知微见著的手法，表现兵乱之后的残破与荒凉。末尾对政府不恤百姓疾苦、急于征税的可恶行径，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他还擅长表现自己的幽人情愫。如《山园》：“岁暮山园懒再行，兰衰菊悴颇关情。青青多少无名草，争向残阳暖处生。”^{[15]2141}陶玉禾《金诗选》卷三评曰：“诗意极深，兰衰菊悴，以况君子，无名草况小人，残阳暖处喻国家也。托意微婉得风人之旨。”赵元也有类似诗作，如其《邻妇哭》通过邻妇的哭诉，直写金朝追胥抓丁的无情场面，控诉了元蒙军队给金朝人们带来的沉重灾难^{[15]2378}，颇有杜甫“三吏”“三别”的风味。时人秦略称赞道：“古人骨冷不复作，主张骚雅非君谁？”^{[3]卷七,358}

将这种反映民生、指陈时弊、感时伤世的风雅之作推向顶峰的，是金末大家元好问。元好问的文学之路，见证了金朝在没落中灭亡的历史。正如杜甫诗歌史书般地记录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现实一样，元好问的诗词创作也是金末元初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贞祐四年，元好问奉母迁居河南三乡。此时的创作如《石岭关书所见》、《箕山》、《禽台》等，主要反映蒙古南侵的罪恶和“宇宙日流血”（《箕山》）的悲惨现实。哀宗即位后，元氏出任镇平、内乡、南阳县令，正大八年，应诏入京。金亡之后，他和其他金朝官民被蒙古兵俘虏，押赴聊城羁管。四年之后，从冠县还乡。从此，过着“元是中原一布衣”（《为邓人作诗》）的遗民生活。遭遇国破家亡的他，将风雅诗论很好地运用于诗歌实践中。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大量反映蒙元军队暴行、揭露金廷腐败和军队懦弱、同情人们疾苦的“纪乱诗”。如“惨澹龙蛇日斗争，干戈直欲尽生灵”（《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岐阳三首》其二）；“铜驼荆棘千年后，金马衣冠一梦中”（《寄钦止李兄》）；“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这些感时伤世的“纪乱诗”，不仅是元好问诗歌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也是金末反映现实诗作的巅峰。《瓯北诗话》卷八评曰：

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如《车驾遁入归德》之“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原有地行仙”，“蛟龙岂是池中物，虮虱空悲地上臣”；《出京》之“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此等感时触事，声泪俱下，千载后犹使读者低徊不能置。盖事关家国，尤易感人。

可见，后世诗评家将元好问与杜甫相提并论，主要在于元氏像杜甫一样创作了大量“感时触事”、“事关家国”且艺术成就颇高的纪乱诗。元好问超越前人之处，是他将自身雄豪之气与“铜驼荆棘”之悲交融在一起，形成了雄浑悲怆的诗风。李调元在《雨村诗话》中感叹道：“元遗山诗精深老健，魄力沉雄，直接李、杜，上下千古，能并驾者寥寥。”^{[16]1535}元诗沉雄豪放，又不乏雅正蕴藉。如翁方纲论元氏五言诗云：“遗山以五言为雅正，盖其体气较放翁淳静，然其郁勃之气，终不可掩，所以急发不及入细，仍是平放处多耳。但较放翁，则已多渟蓄矣。”^{[16]卷五,1446}所谓“淳静”、“渟蓄”，是“中和”之美的体现。

相较而言，李纯甫等人的文学创作风雅的色彩要弱一些，而更多地表现为奇崛险怪的风格。首

先，他们的精神气质都带有尚豪任侠的特点；其次，他们较之赵秉文派的士人命运更加多舛、仕途更为坎坷，大多都为寒士。

世宗、章宗两朝是金朝致治极盛的时代，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都非常繁荣。如章宗朝“名士辈出”，“文治烂然，金朝之盛极矣”^{[1]卷一二,136}。金朝中期科举取士甚多，为广大士子入仕开启了较为宽阔的大门。以词赋科为例，大定二十五年前，词赋进士不过500人，二十八年以后不限人数，取至586人。承安二年取925人^{[6]卷五一,1138}。且章宗朝广开仕途，明昌初增设制举宏词科，以待非常之士；门荫、军功也显著增多。据《金史》卷五五《百官志》统计，大定二十八年，在仕官19700人。然而至泰和七年，在仕官已达47000多。这固然加剧了金朝财政负担，但却给了文人士子们入仕的希望。

这样的时代造就了金代中后期士人积极进取的精神，尤其是生长于明昌、承安时期，成熟于南渡之际以李纯甫为代表的一代。缘此，李纯甫、冯延登等人拥有比前期士人更为恢宏的胸襟、远大的抱负和积极进取的精神。他们大多表现出对前途很高的自信、甚至狂傲。李纯甫“少自负其才，谓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赋》，以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1]卷一,6}。雷渊“生平慕田畴、陈元龙之为人，而人亦以古人期之”^{[3]卷六,314}。张穀“为人豪迈不羁，奇士也”；“雅尚气任侠，不肯下人”^{[1]卷二,12}。王权“为人跌宕不羁。喜功名，博学，无所不觉。酣饮放歌，人以为狂”^{[1]卷二,13}。李汾“喜读史书，览古今成败治乱，慨然有功名心”；“为人尚气，跌宕不羁”^{[1]卷二,19}。雷琯“欲取奇异功名，自喜，亦不羁之士也”^{[1]卷二,22}。

可是宣宗南渡之后，国土日益局狭，国势日薄西山。给士人惨淡前程雪上加霜的是卫绍王、宣宗专尚吏道，胡沙虎和术虎高琪两位权相相继执政，都重用胥吏，厌恶文士，甚至常常借机羞辱文士。元好问《内翰冯公神道碑铭》：“自卫绍王专尚吏道，既以高琪当国，朝士鲜有不被其折辱者。”^{[4]卷一九,445}朝廷权臣恶儒行为引发整个社会风俗由此一变。《金史》卷一〇一《完颜思烈传》曰：

金自胡沙虎、高琪用事，风俗一变，朝廷矫宽厚之政，好为苛察，然为之不果，反成姑息。将帅鄙儒雅之风，好为粗豪，然用非其宜，终至跋扈。牙吾塔战胜攻取，威行江、淮，而矜暴不法，肆侮王人，此岂可制者乎？

这样，不仅朝廷入仕之途受阻，而且地方军镇幕府大门也对文士关闭。文人入仕前景骤然黯淡。

残酷的现实无情地打击着这些文人士子。李纯甫怀着匡时救世的理想给朝廷上万言书，可是执政者却“以迂阔见抑”^{[1]卷一,6}。李天英少有异才，李纯甫见其诗曰：“真今世太白也。”盛赞于诸公之间，其名声由是大震。可是这样一位被时人如此盛誉的士子，竟未能及第，最后落魄不知所终^{[1]卷二,12}。麻九畴“幼颖悟，善草书，能诗，号神童”。在开封府试中，词赋第二，经义第一。南省试，也是如此。可是在御试中以小误被绌。于是，他不再为科举计，隐居乡里。哀宗朝，虽由侯摯、赵秉文举荐入朝，仕宦亦不显^{[6]卷一二六,2740}。李长源“工于诗，专学唐人，其妙处不减太白、崔颢”，可是举进士亦不中。在再举进士试不第的情况下，沦落到武仙幕中，后为仙麾下所杀^①。辛愿在面对现实时，不得不黯然神伤地在《临江仙》中写道：“谁识虎头峰下客，少年有意功名。清朝无路到公卿。萧萧华屋，白发老诸生。”^{[17]51}冀禹锡《哭刘从益诗》云：“醉乡广大宽留地，仕路崎岖小作程。”^{[15]2753}“无路到公卿”、“仕路崎岖”是辛愿等一代士子人生的真实写照。

蒙古入侵、贞祐南渡、权臣干政，犹如一阵阵突兀而起的寒风，将人们带入意想不到的萧瑟秋季。文人士子们早先那立致公卿的自信与豪放，为时运不济的愤慨和消世避世的隐逸情怀所取代。本以为功名俯首可拾、唾手可得的李纯甫等人，万万没有想到现实如此残酷，命运如此不偶，失意心态自然流露为怪奇、苦涩的诗歌。

李纯甫等并没有像赵秉文、元好问等人那样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而是认为诗不过“各言其志也已矣”^{[8]2626}，李派主要代表人物李长源推崇的“发愤著书”说^{[15]2760}就与“不平则鸣”主张相似。可

① 参见《归潜志》卷二“李汾长源”小传和《中州集》卷六“李讲议汾”小传。

见,李纯甫等人更倾向于师法韩孟诗派,将自我磊落不平之气和各种个性情怀都展现出来,凸显文学的抒情性特质。他们不像赵氏那样主张博学古人,注重学养积累,而是强调师心,“字字皆以心为师”^{[15]2074};还主张独创,教导后学为文作诗“当别转一路,勿随人脚跟”^{[1]卷八,87}。

他们的理论主张表现在创作中,多为奇古险怪的风格。雷渊“论文尚简古,全法退之。诗亦喜韩,兼好黄鲁直新巧”^{[1]卷八,88}。李纯甫文不出庄、左、柳、苏,诗不出卢仝、李贺^{[1]卷八,87}。其《怪松谣》言:“阿谁栽汝来几时,轮囷拥肿苍虬姿。鳞皴百怪雄牙毗,拿空天娇蟠枯枝。疑是秘魔岩中老慵物,旱火烧天鞭不出。睡中失却照海珠,羞入黄泉蜕其骨。石钳沙锢汗且僵,埋头卧角政摧藏……”^{[15]2080}全诗紧扣一个“怪”字,立意怪、用语怪、构像怪。这正是作者心中抑郁不平之气的宣泄,怪松的形象无疑是怀才不遇、卓荦不群的诗人自身写照。赵秉文曾论其文曰:“文字无太硬,之纯文字最硬,可伤!”王若虚亦云:“之纯虽才高,好作险句怪语,无意味。”^{[1]卷八,89}可见,好用硬语、怪语是李诗的鲜明特色。李经为诗极刻苦,喜出奇语,不蹈袭前人^{[6]卷一二六,2733}。

四

南渡以后,诗学革新运动为扫除明昌、承安时期浮艳、尖新之风,树立反映现实、抒发性情的新诗风,功不可没。可是它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弊端,因而是功过杂陈的。李纯甫一派承继韩孟诗派,形成险怪雄奇的风格,好用硬语、险韵,比明昌时的尖新诗风影响更大。因此,遭到了赵秉文、王若虚和元好问等人的批评。不过,赵秉文等人力主风雅,对文学发展亦有不少负面影响。

其一,过分抑宋崇唐,与文学史实不符。赵秉文认为唐人比宋人更具忠厚之气,似不甚妥当。宋代士人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二程等人,无论是儒学素养,还是儒家淑世精神,并不亚于唐人。赵氏、王飞伯等人认为诗文要师法唐以前诸家,于宋人不论,王若虚就曾指出这一弊端:

近岁诸公以作诗自名者甚众,然往往持论太高,开口辄以《三百篇》、《十九首》为准,六朝而下,渐不满意,至宋人殆不齿矣。此固知本之说,然世间万变,皆与古不同,何独文章而可以一律限之乎?就使后人所作,可到《三百篇》,亦不肯悉安于是矣。何者?滑稽自喜,出奇巧以相夸,人情固有不能已焉者。宋人之诗,虽大体衰于前古,要亦有以自立,不必尽居其后也。遂鄙薄而不道,不已甚乎!^{[11]92-93}

宋代文化和文学是唐以后又一高峰,金代后期士人视宋学“宝山”而不顾的做法甚是偏颇。

其二,风雅一派流绪自我标榜,给文坛增加无谓之争执。元好问评论当时风习时说:“南渡以来,诗学为盛。后生辈一弄笔墨,岸然以风雅自名。高自标置,转相贩卖。少遭指擿,终死为敌。”^{[3]卷一〇,485-486}《归潜志》卷八亦载:“南渡以来,士人多为古学,以著文作诗相高。然旧日专为科举之学者疾之为仇雠,若分为两途,互相诋讥。”

其三,文学风格的多样性受到制约,文学的抒情特质容易被忽视。如赵秉文选编明昌时党怀英、赵沨、路铎、刘昂、师拓、周昂和王碉七人诗作为《明昌辞人雅制》^{[3]卷四,196}。这七人有两个相似之处,一是尊唐而轻宋的倾向,二是多为闲谈、质实之作,与当时浮艳诗风迥异,这可能是赵氏编选的主要标准。从书题“雅制”可看出,编者偏重雅正特色。明昌时文学风格多样,即使是党、赵等七人,他们的文学创作也呈现出纷繁丰富的多样性,而不仅仅是那些所谓的“雅制”之作。又如元好问编《唐诗鼓吹》^①,诗歌样式只选七律;时代重中晚唐而轻盛唐,盛唐作家只选王维、高适等数人,总计十五首,仅占全书百分之二点五;

^① 《唐诗鼓吹》的编者是谁,历史上有不同说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唐诗鼓吹》)不著编辑者名氏。据赵孟頫序称,为金元好问所编,其门人中书右丞郝天挺所注。”有人提出异议,如沈德潜《说诗晬语》对元氏说提出质疑(参见沈德潜著、霍松林校注《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页)。

诗歌主题侧重于感时伤怀。由此可见，编选者没有兼顾文学风格的多样性。

[参 考 文 献]

- [1] 刘祁：《归潜志》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Liu Qi, *Guiqian Zhi*: Vol. 8,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 [2] 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Kong Yingda, *Maoshi Zhengyi*: Vol. 17, in *Shisan Jing Zhush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 [3] 元好问编：《中州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Yuan Haowen(ed.), *Zhongzhou J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9.]
- [4] 姚奠中编：《元好问全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Yao Dianzhong(ed.), *Yuan Haowen Quanji*, Taiyuan: Shanx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4.]
- [5] 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丛书集成初编》第2412—2414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Zhao Bingwen, *Xianxian Laoren Fushui Wenji*, in *Congshu Jicheng Chubian*: Vol. 2412—2414,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6.]
- [6] 脱脱：《金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Tuotuo, *The History of Chin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5.]
- [7] 张博泉等著：《金史论稿》，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Zhang Boquan, et al., *Chinshi Lungao*, Changchun: Jili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ublishing House, 1992.]
- [8] 阎凤梧编：《全辽金文》，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Yan Fengwu(ed.), *Quan Liao Chin Wen*, Taiyuan: Shanx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9] 李有棠：《金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Li Youtang, *Chinshi Jishi Benmo*,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 [10] 宇文懋昭著、崔文印校证：《义宗皇帝纪》，《大金国志校证》卷二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Yuwen Maozhao & Cui Wenyin, "Yi Tsung Huangdi Ji," in *Da Chinguo Zhi Jiaozheng*: Vol. 26,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 [11] 王若虚著，霍松林、胡主佑校点：《滹南诗话》卷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Wang Ruoxu, Hu Songlin & Hu Zhuyou, *Hunan Shihua* (I), Beijing: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62.]
- [12] 郝经：《遗山先生墓铭》，《陵川集》卷三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Hao Jing, "Yishan Xiansheng Muming," in *Lingchuan Ji*: Vol. 35,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6.]
- [13] 郭绍虞笺释：《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Guo Shaoyu, *Yuan Haowen Lunshi Sanshishou Xiaojian*, Beijing: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8.]
- [14] 周惠泉：《金代文学论》，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Zhou Huiquan, *On Literature in Chin Dynasty*, Changchu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97.]
- [15] 阎凤梧、康金声编：《全辽金诗》，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Yan Fengwu & Kang Jinsheng(eds.), *Quan Liao Chin Shi*, Taiyuan: Shanx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99.]
- [16] 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Guo Shaoyu(ed.), *Tsing Shihua Xubian*: Vol. 3,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3.]
- [17] 唐圭璋编：《全金元词》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Tang Guizhang(ed.), *Quan Chin Yuan Ci* (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9.]